

第一章 伪满洲国童话写作与“未来国民”的塑造^①

1932年至1945年，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部地区建立了一个傀儡的“国中之国”——伪满洲国。在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期间，殖民者指派和民间自发的童话作者，发表了数量可观的童话作品。本章从探究伪满洲国童话概念的源流开始，对这一时期公开出版的童话作品进行梳理，分析殖民者如何利用童话，进行“未来国民”的塑造，查看伪满洲国殖民中后期“官方植入式”童话创作的题材与主旨，并以当时知名杂志和童话作家为例，分析伪满洲国童话写作的两种分流与多重向度，以此呈现殖民地童话创作的复杂性与特殊性，解读童话作家创作的自觉与不自觉，还原他们对“王道乐土”的虚构与解构，揭开80多年时空封印下，伪满洲国的童话写作。

^① 本章部分内容已发表在《社会科学辑刊》，详见陈实：《伪满洲国童话写作与“未来国民”的塑造》，《社会科学辑刊》，2016年第2期，第168—179页。

第一节 伪满洲国“童话”的源流

故探文章之源者，当于童话民歌求解说也。

——周作人《童话研究》（1932）^①

中国现代文学家、文艺理论家周作人（1885—1967），曾明确指出童话的重要性，他认为，探寻文学起源，应该从童话民歌中追求答案。

在中国现代文学的长河中，童话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支流。童话也是中国东北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日本的侵略并不能割断文学的源流。东北沦为殖民地之前的童话概念，也必然影响着这一区域后来的童话创作。因此，要探寻伪满洲国童话的面貌，须从20世纪初中国“童话”的概念与内涵开始。

“童话”这个名词从出现至今，一直处于流变之中，以至于几乎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公认完美的定义。“童话”在中国的起源，始于1908年11月清末目录学家孙毓修（1871—1922）^②编译、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“童话”丛书，这是中国第一套以“童话”命名的书籍。^③对于“童话”的定义，主编人孙毓修在《初集广告》中指出：“故东西各国特编小说为童子之用，欲以启发智识，含养德性，是书以浅明之文字，叙奇诡之情节，并多附图画，以助兴趣；虽语言滑稽，然寓意所在必轨于远，阅之足以增长见识。”^④从编著人的

① 周作人：《童话研究》，《周作人与儿童文学》，杭州：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，1985年8月，第69页。

② 孙毓修，清末目录学家、藏书家、图书馆学家，江苏无锡城郊孙巷人。

③ 对于“童话”丛书的出版时间，国内有几种不同的说法，集中于1908和1909年，较为详细的考证见朱自强：《“童话”词源考——中日儿童文学早年关系侧证》，《东北师大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，1994年第2期，第30—35页。经笔者查证，1909年2月15日（宣统元年正月二十五）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教育杂志》创刊号第1—2页，刊登了一篇《介绍批评》，其中介绍“童话第一集”已出二册，由此时间推测1908年较为信服。

④ 转引自金燕玉：《中国童话的演变》，《苏州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，1992年第2期，第75页。

定义看,“童话”仍与“小说”概念模糊在一起,“为童子之用”界定了受众,其后都是在解释童话“寓教于乐”的教育功能。这说明童话概念被引进中国之初,就与“智识”“德性”的教育联系在一起。

周作人是中国童话研究的先驱。1913年,他提出“童话者,幼稚时代之文学,故原人所好,幼儿亦好之,以其思想感情同其准也”^①。点明了童话是最接近儿童思维的文学。在另一篇文章《童话略论》中,谈及童话的概念,他认为“童话(Märchen)本质与神话(Mythos)世说(saga)实为一体”^②。这种概念互相渗透包容的解释,展示了童话起源和定义的复杂。该文中,周作人还提出了“童话之应用”,阐述了童话对于儿童教育的意义和在应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。

20世纪20年代,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爆发,儿童文学,特别是童话的翻译成为一种热潮。1922年,文学史家郑振铎(1898—1958)^③在上海创办的《儿童世界》杂志,是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阵地,童话被作为该杂志一个重点推介的栏目。这一时期,在鲁迅(1881—1936)、周作人、郑振铎、叶绍钧(1894—1988)^④等知名学者的推动下,大量来自英国、俄苏、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波斯等国家的童话——如安徒生、格林兄弟、王尔德、普希金、爱罗先珂等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。

童话概念的研究如影随形。1922年1月9日至4月6日,周作人与当时一样热衷研究童话的文学史家赵景深(1902—1985)^⑤通过公开信的形式,对童话的起源、概念及内涵问题进行了大讨论。^⑥在这些讨论中,周作人明确提出了“教育童话”这一概念:“近代将童话应用于儿童教育,应该别立一个教

① 周作人:《童话研究》,《教育部编纂处月刊》第1卷第7期,1913年8月。

② 周作人:《童话略论》,《绍兴县教育会月刊》第2号,1913年11月15日。

③ 郑振铎,生于浙江温州,原籍福建长乐,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、文学评论家、文学史家、翻译家、艺术史家,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、训诂家。

④ 叶绍钧,字秉臣、圣陶,生于江苏苏州,现代作家、教育家、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。

⑤ 赵景深,曾名旭初,笔名邹嘯,祖籍四川宜宾,生于浙江丽水,中国戏曲研究家、文学史家、教育家、作家。20世纪初至30年代,曾致力于童话的翻译和理论研究。

⑥ 这些公开信讨论最初连载于《晨报副刊》,1922年1月9日至4月6日,后收录于赵景深《童话论集》之中。详见赵景深:《童话的讨论》,《童话论集》,上海:开明书店,1927年9月,第55—75页。

育童话的名字，与德国的 keinder—Märchen 相当——因为说‘儿童童话’似乎有点‘不词’。”^①他们还讨论了“童话”作为外来词，在各种语言中的对应物，试图确定“何为童话”。

“童话”初现中国之时，很难界定它的概念的范围，英语世界里代表神话的“mythology”、代表传说的“legend”、代表民间故事的“folktale”、代表仙子仙女故事的“fairytale”、代表寓言的“fable”、代表奇幻故事的“Fantasystory”，在中文里都可能被译为“童话”。而童话其他的传入语种，俄语里“Сказка”、朝鲜语里“동화”、德语里的“Märchen”、北欧的“Saga”等等，也可能被统称为童话。对此，周作人写道：

童话的训读^②是 Wanabenomonogatari，意云儿童的故事。但这只是语源上的原义，现在我们用在学术上却是变了广义，近于“民间故事”——原始的小说的意思。童话的学术名，现在通用德文里的“Märchen”这一个字，原意虽然近于英文的 wonder—tale（奇怪故事），但广义的童话并不限于奇怪。至于 fairytale（神仙故事），这名称虽然英美因其熟习至今沿用，其实也不很妥当，因为讲神仙的只是童话的一部分。而且 fairy 这种神仙，严格的讲起来，只在英国才有……^③

这段文字表面上是在探讨童话在各国不同的名称，事实上则是纠结于童话的概念与内涵，展示了童话与民间故事、小说、神话、神仙故事等其他文学形式之间的复杂关联。

1927 年，赵景深在其著作中，再次探讨了童话的概念，他的观点中明显引用了周作人在 1922 年的理论：

① 赵景深：《童话的讨论》，《童话论集》，上海：开明书店，1927 年 9 月，第 59 页。

② 训读（训読み），是日文所用汉字的一种发音方式，是使用该等汉字之日本固有同义语汇的读音。

③ 这段文字来自周作人写给赵景深谈童话的信，转引自赵景深：《童话的讨论》，《童话论集》，上海：开明书店，1927 年 9 月，第 57 页。

那么用“童话”两字好不好呢？这是很容易引起误会的。望文生义（义），不妨说：“童话者，儿童所说之语言也。”甚至有人把吕新吾的《小儿语》^①也当做童话，孙毓修把儿童小说也包了进去，这样，童话又成了叙述儿童生活的小说了。……十八世纪中日本小说家山东京传在《骨董集》里始用“童话”这两个字，曲亭马琴在《燕石杂志》和《玄同放言》中又发表许多童话的考证，于是这名称可说是完全确定了。^②“童话”两字既成术语，而中、日又同文，所以我觉得用“童话”的名称比英文的菲丽故事和德文的神怪故事都好。这是理由一……原始人类知识浅短，思想简单，儿童也是如此；原始人类分不清人和动植物，儿童也是如此；原始人类信仰鬼神，儿童也是如此……总之，儿童就是原人的缩影，当然童话也就可以算作原始社会的故事了……这是理由二。^③

赵在分析了童话的内涵后，给出童话是“从原始信仰的神话转变下来的游戏故事”的概念，^④这一说法很容易混淆神话、传说与童话的区别。于是他在1929年的《童话学ABC》中，阐述了“什么不是童话”，提出“童话不是小儿语”“童话也不是小说”“童话也不是神话”这三个“不是”，最后给童话下的定义是“童话是原始民族信以为真而现代人视为娱乐的故事。简单而明了的说，童话是神话的最后形式，小说的最初形式”。^⑤

① 《小儿语》并非吕新吾所作，是其父吕得胜为儿童诵习有教育意义的儿歌而著。吕新吾所作是《续小儿语》，此处应为赵景深笔误或谬记。吕新吾，即吕坤（1536—1618），字叔简，号新吾，河南宁陵人。

② 赵景深关于童话一词来自日本的论述，虽未加引注，但实为周作人的论述，是1922年周作人与赵书信讨论童话问题时提及的。详见赵景深：《童话的讨论》，《童话论集》，上海：开明书店，1927年9月，第57页。

③ 赵景深：《童话概要》，上海：北新书局，1927年7月，第7—9页。

④ 赵景深：《童话概要》，上海：北新书局，1927年7月，第12页。

⑤ 赵景深：《童话学ABC》，上海：世界书局，1929年2月，第1—4页。



赵景深《童话学 ABC》1929 年原版书影

然而这些定义依然边界模糊。原始人信何物为真无法考证，现代人视为娱乐的故事又多而繁杂。事实上，即便是“童话”词源地日本的作家学者，这一时期对童话的定义也涵盖广阔。1935 年，日本现代著名童话研究学者松村武雄（1883—1969）^①在其著作中写道：

我们的所谓“童话”之中，包括幼稚园故事、无意义谭、滑稽谭、寓言、神仙故事、神话、传说、历史谭、自然界故事以及时事谭等等。在这一点上，是和欧洲从前狭隘的立场——童话只限于所谓神仙故事（Märchen, Fairytale）——相反而与近时的倾向——将给与孩子的一切种类的故事都包括在内的广大的立场相一致。^②

由上可见，20 世纪 30 年代，日本的童话概念，并没有将寓言、神话、神仙故事、传说等加以区分，而将“给与孩子的一切种类的故事”都归于童话，甚至连历史、时事都归于其中。这类著作以及宽泛概念下创作的日本“童话”，经过翻译流传于中国，无疑使得童话的概念更加难以界定。

^① 松村武雄，文学博士，日本现代著名神话、童话研究学者，九州熊本县人。主要著作有《神话学论考》《民俗学论考》《神话学原论》等。

^② 松村武雄著，钟子岩译：《童话与儿童的研究》，上海：开明书店，1935 年版，第 4 页。

而在中国 1936 年版《辞海》^①上，对童话的定义如下：“特为儿童编撰之故事。大抵凭空结构，所述多神奇之事，行文浅易以兴趣为主。教育上用以启发儿童之思想，而养成其阅读之习惯。”^②这与松村武雄宽泛的“故事概念”并无二致，凡是“为儿童编撰”而“凭空结构”的“神奇故事”都可以是童话了。而且一个显著的特征是，再次强调了童话在“教育上”的意义。

这种重视教育意义的童话概念，必然影响着中国东北地区的现代文学创作。正如《东北儿童文学史》中在评价东北现代文学中童话萌芽时写道：

“1920 年至 1921 年间，在东北儿童文学园地还出现了童话、寓言故事及理想小说等富于幻想色彩的儿童文学品种。童话及寓言故事大多以动物为主人公，而且故事中含有明显的教育意义。”^③

① 《辞海》是中国权威的大型综合性辞书。1915 年陆费逵动议编纂，1936 年、1937 年上下两册分别由中华书局在上海出版，是为《辞海》的第一版，也常被称作“1936 年版”。其主编者舒新城、徐元诰、张相、沈颐。

② 转引自史济豪：《童话的特征和定义与中国古代童话——与张士春同志商榷》，《宁夏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，1982 年第 4 期，第 76—80 页。

③ 马力、吴庆先、姜郁文：《东北儿童文学史》，沈阳：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，1995 年 12 月，第 45 页。

第二节 何为伪满洲国的童话

童话是教育第二代，使他们涵养成完善的国民的滋养。

——冷歌《怎样鉴赏童话》（1944）^①

伪满洲国知名编辑人冷歌（1908—1994）^②提出，童话是教育下一代，培养未来“国民”的重要工具。他的观点延续了童话的“教育”内涵，培养未来“国民”，则与伪满洲国官方意识如出一辙。在伪满洲国存在的14年中，童话虽然发展缓慢，却不容忽视，而且被殖民地官方文化机构看作教育“少国民”的重要文化殖民工具。而伪满洲国的童话概念有什么特点，成为研究的首要问题。

如前所述，“童话”这一名词来自日本，中国的童话概念也多受日本理论的影响，且非常重视其教育功能。伪满洲国作为日本的傀儡国，在童话概念的传播与接受上，必然受到更多“日本概念”影响。这并不是一种猜测，另一位知名编辑人吴郎（1912—1957）^③就曾在一篇谈论伪满洲国文学与日本文学渊源的文章篇首这样写道：“满洲新文学和日本文学的葛藤关系，敢断言从胎动期到生长的过程，没有一时不受到日本文学的哺育与激动的，自然，我们不否认前期满洲新文学也曾和西洋文学有过渊源……”^④伪满洲国“建国”于1932年，吴郎所说的“前期”西洋文学，正是沦陷之前中国大量的翻译童话作品，这些童话多数后来也得以在伪满洲国翻印发行，这对伪满洲国童话作家产生了很大影响。由于伪满洲国的地理和历史原因，俄苏和朝鲜童话的影响也不容忽视。

① 冷歌：《怎样鉴赏童话》，《新满洲》第6卷第4期，1944年4月，第96页。

② 冷歌，原名李乃庚，笔名李文湘、冷歌，曾留学日本，是伪满洲国末期知名的编辑和诗人，代表作有《船厂》等长诗。

③ 吴郎，原名季守仁，曾担任伪满洲国期刊《斯民》（后更名为《麒麟》）编辑、《新满洲》编辑人，他是伪满洲国知名女作家吴瑛的丈夫，1957年因政治原因自杀。

④ 吴郎：《满洲文学与日本文学》，《新满洲》第4卷第12号，1942年12月，第85页。

各国的童话概念经过翻译者的转述，以及日本理论家的影响，使得伪满洲国文学界的童话概念更是五花八门。仅以1940年前后伪满洲国公开发表文章中出现的概念为例，即可窥见一斑。而且正是这一时期，伪满洲国的童话创作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高潮。

1938年，吉林师道高等学校教授安倍三郎著的《（满语）^①儿童心理学》^②中，将童话分为了“狭义”“广义”两种：“狭义之童话，非如寓言之有显明道德目的，又不若历史之说明事实，而与时代有关系者，又不能如传说等，作成国民信仰之基础。仅为由于人之自由想象，所生之谈话故事。但广义之童话者，则凡为儿童所爱好之一切故事，如神话、民族童话、传说、寓言、假作故事、英雄谭、历史谭等皆是也。”

1942年，《盛京时报》^③上一篇未署名的文章，开篇便阐明了“童话的分类，世人主张不一”，并介绍“日本的儿童文学界的权威，大都这样分法”：

“一、神话——关于天地生成，日月星辰，人类原如始的童话；二、寓言——含有讽刺、教训意味的故事性之童话；三、御伽新——仙怪的故事。西洋叫フェレティルヌ，亦即满洲小孩所谓‘仙话’（常误为瞎话）；四、艺术儿童话——即文学的儿童话，有表面及内面二种意义，小孩子可读出表面的意义，成人、文学欣赏者则得其契意。世界上代表作如下：神话——自然诸神话传说，希腊神话，基督教神话等；寓言——伊索寓言，庄子，列子寓言，托尔斯泰寓言等；御伽新——天方夜谭，格林兄弟童话；艺术儿童话——安德生童话，如《鹤》及《卖火柴的女儿》，托尔斯泰童话，如《呆子伊凡》；淮尔德童话，如《安乐王子》；小川未明童话，如《某夜星语》。外有近年特脱离神仙、故事及艺术过重色彩而作之纯教育童话，如滨田广介氏^④和叶绍钧二人，是可以推为东方代表作家的。”^⑤

① 此处“满语”即汉语。日本殖民者在伪满洲国为文化殖民需要而将“汉语”称为“满语”。

② [日]安倍三郎：《（满语）儿童心理学》，“新京”（今长春）：满洲图书株式会社，1938年10月10日，第123—124页。

③ 《盛京时报》是日本人中岛真雄于1906年10月18日在沈阳创办的报纸，1944年9月14日终刊，历时38年。日本侵华后该报在沈阳发展迅速，成为日本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。

④ 滨田广介（1893—1973），日本著名的儿童文学家，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英文系，长期从事儿童文学编辑工作和创作。1953年他因对儿童文学的贡献而被授予文部大臣奖。

⑤ 《童话的分类和代表作家》，《盛京时报》，1942年12月6日。

这种将童话与寓言、神话等形式混为一谈的“广义”“权威”分法，证实了当时流入伪满洲国的日本童话概念，确有前文松村武雄所描述的那样一种包罗一切的“倾向”。而在同时期的伪满洲国文坛，“艺文志派”的核心人物、著名作家古丁（1914—1960）^①1938年正摇起“写印主义”“无方向的方向”运动的大旗，强调不该提出某一方向（主义）来束缚文坛。^②这种只管“写与印”，不要限于概念与条条框框，主张先从作品数量上繁荣伪满洲国文坛的号召，在当时影响很大。这也可能是当时伪满洲国童话概念宽泛，与神话、传说、寓言等形式之间界限模糊的一个原因。

《盛京时报》这篇文章关于童话的分类，提出了两个与前文显著不同的概念，一是提出孩子和成人都可以读“艺术儿童话”，这种童话“表面”为儿童准备，“内面”则为成人提供；二是提出这一时期出现了“纯教育童话”，将两位分别来自日本和中国的作家推为“东方代表作家”，似在提倡这种“脱离神仙、故事及艺术过重色彩”而有教育意义的童话形式。

无独有偶，1942年，《新满洲》^③刊发了一期“童话特辑”。1943年，在一篇针对这一特辑的评论文章中，作者将伪满洲国的童话分为“民间的童话”“教育的童话”和“文艺的童话”三类。^④这种分类方式并不科学，“民间”是童话的来源，“教育”是童话的功用，“文艺”则是童话的风格，这三种特性完全可以存在于一篇童话之中。但这说明，伪满洲国的童话创作圈，十分重视童话的文艺性与教育意义。而“纯教育童话”“教育的童话”等名词的频频出现，更是显露出一一种强烈的功利性。

如前文所述，伪满洲国的一些童话概念，认为童话的读者也可以是成人。这一点，与伪满洲国一些童话作家的观点相似。伪满洲国知名作家杨慈灯

① 古丁，伪满洲国著名作家、文艺评论家，原名徐长吉，建国后改名徐汲平，笔名古丁、史之子、史从民等。1914年9月29日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。曾参与伪满洲国知名杂志《明明》《艺文志》的创刊与编辑。1941年10月集资建立株式会社艺文书房出版社并出任社长，专门从事文学出版事业。

② 冈田英树著，靳丛林译：《伪满洲国文学》，长春：吉林大学出版社，2001年2月，第75页。

③ 《新满洲》是伪满洲国大型的文化综合商业杂志，月刊，1939年1月在长春创刊，终刊于1945年4月，历时7年，共刊出74期，该刊由“满洲图书株式会社”主办。创刊时编辑人是“满洲图书株式会社”编纂室主笔王光烈，从第4卷11月号开始由季守仁（吴郎）任编辑人，发行人是“满洲图书株式会社”常务理事日本人驹越五贞。

④ 陶敏：《我看到新满洲的童话》，《新满洲》第5卷第12期，1943年12月，第108页。

(1915—1996)^①这一时期创作了大量的童话作品,1939年,他在谈及童话受众时提出:“近代的童话,不一定是专给小孩子读,有许多童话那作者的目标是正对成年人的灵魂,像鲁迅所译的《小约翰》^②,小孩子能看得懂么?作者一下笔就说:‘我不是给你们预备的……’”他认为不仅读者可以是成人,童话中出现一些成人元素也无伤大雅,“儿童本来都有好奇心,如果叫他胡乱去猜想,不如爽爽快解释给他的好”。^③因此他在童话中,描写了很多现实社会、成人社会里的不美好,甚至恐怖灰暗的场景。

有同样创作理念的,还有伪满洲国作家未名(1913—1942)^④。他的一些童话常深刻而富有哲理,将讽刺含蓄地隐藏于童话之中。这些文笔斐然的“童话”,儿童根本无法解读其深意,而其阴沉悲愤的文风,也并不适合儿童阅读,这类童话更像是一种童心修饰下的小说。

1944年,冷歌提出童话是“由古代民间口头传说的故事发扬出来的,这些口头传说的故事,其中大半是说述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和宗教方面的事情;带着神秘或教训的意味是其特别的征象”^⑤。这个概念,强调了童话的文化遗产意义,而“教训”成了“神秘”之外童话的唯一特征。然而,伪满洲国童话的“教训”的对象是谁呢?冷歌明确指出,是伪满洲国的“第二代”,这里“不止是小国民——甚至是犹在冲龄的玩童有接近童话的必要,即是较大的,接近青年时代的幼小者,更进一步说,即使是更大一点年岁的,也有其需要——童话”^⑥。这就是说,从幼儿到青年,甚至更大年纪的成年人,都已被列入伪满洲国童话的“教育”范围。

综上所述,与20世纪初中国的童话概念相比,伪满洲国的童话概念界限

① 杨慈灯,辽宁大连人,祖籍山东,伪满洲国知名作家,尤擅军旅小说和童话。原名杨小先,笔名杨剑赤、杨上尉、赤灯、慈灯、夏园等。

② 《小约翰》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荷兰作家弗雷德里克·凡·伊登(1860—1932)的作品,被译者鲁迅称为“无韵的诗,成人的童话”。

③ 慈灯:《再谈怎样写童话》,《泰东日报》,1939年12月19日至21日连载。

④ 未名,原名姜灵非,笔名灵非、未名等,山东黄县人,伪满洲国知名作家。1930年在沈阳读书时,曾主编《南郊》。1931年同成雪竹等组成冷雾社,编辑出版《冷雾》。1934年开始在长春《大同报》、沈阳《大亚公报》等报刊上发表小说等作品,其中有长篇小说《新土地》《灰色命运与战栗的人》(未连载完),短篇小说《三人行》《人生剧场》《易妻记》等。1935年后先后编辑过沈阳《新青年》和《满洲新文化月报》。1942年8月病逝,年仅29岁。

⑤ 冷歌:《怎样鉴赏童话》,《新满洲》第6卷第4期,1944年4月,第94页。

⑥ 冷歌:《怎样鉴赏童话》,《新满洲》第6卷第4期,1944年4月,第96页。

更为模糊，涵盖更为宽泛，且把受众从儿童扩展到成人，更加重视童话的教育功能。将受众扩展至成人，就难免忽略儿童思维，使童话失去“童趣”；太过于重视教育功效，则容易缺少故事性而落于生硬的说教。这样就不难理解伪满洲国的童话作品中，为什么有相当数量有童话之名却“不像童话”的“童话”了。

根据笔者梳理，伪满洲国时期，各大刊物上明确标注“童话”或符合童话概念而被划归为“童话”的作品主要有以下几种（不完全统计）：

- 一、童话、寓言、神话、传说、趣谈等；
- 二、历史故事、民间故事、英雄故事、神仙故事、鬼怪志异等；
- 三、儿童小说、教育故事、儿童故事、科幻故事、动物小说等。

由于本书研究 1932—1945 年间伪满洲国的童话，当时的童话概念决定着童话作品的创作，而东北光复（1945 年）后的童话“未来概念”并不适用于本书所讨论的伪满洲国时期的童话。因此，为了更好地呈现殖民文化视角下的童话创作，所有伪满洲国时空之内被认为是“童话”的作品，都将被纳入本书的视线。